

高適岑參選集

高文
王劉純選注

高文
王劉純
選注

高適岑參選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選集

高適岑參選集

高 文 王劉純 選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苏如东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1.375 插頁 2 字數 260,000

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4,000

ISBN 7-5325-0284-8

I·124 定價: 4.90 元

前言

邊塞詩至唐代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，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：

(一)出現了一大批寫邊塞詩的作家，陳子昂、王之渙、崔顥、王翰、王昌齡、高適、岑參、李頎、柳中庸、盧綸、李益、常建、陳陶等，創作出大量有關邊塞的名篇，超過了以往時代。至於偉大的詩人李白、杜甫，還有山水詩人王維等，也寫過膾炙人口的邊塞名作，特別是在盛唐出現了邊塞詩派。

(二)邊塞詩不僅數量多，而且題材廣泛，全面反映邊塞戰爭，邊塞生活和征夫思婦的思想感情。大量作品達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。

(三)邊塞詩的形式多樣，體裁完備，有七言歌行，五、七言絕句，五古，五、七律等，這也是過去所未有的。

(四)出現了傑出的作家高適、岑參，其創作代表了唐代邊塞詩的最高成就。但他們的優秀作品又並不限於邊塞詩。

(五)邊塞詩以其輝煌燦爛的成就，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，成為唐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，並

起到了承前啓後的重大作用。

任何一個文學流派的產生，都有一定的社會、歷史原因和文學內部的承繼、發展等因素。邊塞詩派也是這樣，它的產生、發展和繁盛，與時代有着密切的關係，同時，也是它本身不斷發展的結果。

首先，盛唐經濟的高度繁榮、政治空前統一，國勢強盛，構成了邊塞詩派產生的基本條件。高適、岑參創作的主要階段是在盛唐時期，即唐玄宗開元、天寶年間。這時的唐王朝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封建帝國。自有唐開國以後，就十分注重邊疆經濟的開發。以邊塞詩派所描寫的題材最集中的隴右、西域地區為例，天寶十二載，「是時中國盛強，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，閭閻相望，桑麻翳野，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」（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一六）。沿着漢代開闢的中西交通孔道「絲綢之路」，新形成許多繁華的城市和富庶之地，如涼州、張掖、酒泉、燉煌等。岑參詩中即有「涼州七里十萬家」（《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》）的描繪。又如北方，開元初於營州重築柳城，「開屯田八十餘所，追拔漁陽、淄青沒戶還舊田宅，又集商胡立邸肆。不數年，倉廩充，居人蕃輯」（《新唐書·宋慶禮傳》）。因此，富有傳奇色彩的邊地生活，引起詩人們的興趣，邊塞新異的風土人情、山水風光，為詩人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，吸引他們去開闢一個新的表現領域。

其次，唐王朝加強國內各民族之間以及歐、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，實行較進步的民族政策。例如貞觀二十一年五月，太宗嘗云：「自古皆貴中華，賤夷、狄，朕獨愛之如一」（《資治通鑑》卷一九八）。為促進民族團結，貞觀十五年（六四一），太宗遣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；中宗景

龍元年（七〇七），又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尺帶丹珠。唐蕃和親數十年。至玄宗朝，「依貞觀故事」，姚崇爲相，即以「不幸邊功」等十事進諫。盛唐各民族間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加深，許多少數民族商人、藝人、學者居留長安，以至入仕朝廷，漢族人民也在邊境與當地居民一起從事生產勞動，和睦相處。民族友好的和平氣氛，代表着廣大人民的共同意願，也成爲邊塞詩人歌咏的主題。

其三，由於民族矛盾引起的邊塞戰爭，是邊塞詩產生的一個直接原因。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，都必然經過各民族間的鬥爭和融合。因此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民族矛盾，這也是我們多民族國家在形成過程中的歷史必然現象。一方面，由於唐代邊地許多異族還大都處於氏族奴隸制的社會形態，對唐朝「強則進兵抄掠，弱則竄伏山林」，其部族首領違背各族人民的意願，連年在西北、西南、東北等邊地劫掠侵擾，時降時叛。如武后聖曆元年（六九八），東突厥默啜可汗攻陷趙州，盡殺所掠趙、定州男女萬餘人（《舊唐書·則天后本紀》）；開元二年，吐蕃將衆十萬寇臨洮，軍蘭州，至於渭源，掠取牧馬（《資治通鑑》卷二二一）；八年十一月，「突厥寇涼州，殺人掠羊馬數萬計而去」（《舊唐書·玄宗本紀》）。諸如此類的戰爭還很多，這是一種掠奪性的戰爭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唐玄宗好大喜功，邊將中以便功媚上邀寵者亦不乏其人。如天寶十載、十三載的兩次征南詔就是，這是唐對少數民族的侵擾，也是非正義的。

盛唐國勢的強盛，還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。這種時代的主要精神特徵，激發了詩人對建樹功勳的憧憬。尤其是廣大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士人，具有奮發向上的精神，報効國家的

壯志，因而投筆從戎、慷慨從軍，形成了一種時代風尚。

同時，唐統治者重武功，文人入幕也是一個進身機會。明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二十七云：「唐詞人自禁林外，節鎮幕府爲盛，如高適之依哥舒翰，岑參之依高仙芝，杜甫之依嚴武，比比而是。中葉後尤多。蓋唐制，新及第人，例就辟外幕。而布衣流落才士，更多因緣幕府，躡級進身。」這些文人深入邊塞，有着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感受，寫出了歌頌戰士愛國精神和描繪邊塞雄奇瑰麗浪漫色彩的詩篇。

唐代實行府兵制。戰士的長期戍邊和大量的犧牲，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。這種現實也激起詩人們的憤慨和同情，因此，也出現了反映戰爭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主題。對於不同性質的戰爭，詩人自有不同的反映，只有認識了上述社會原因和邊塞戰爭性質的複雜性之後，才會對盛唐邊塞詩多樣性的主題，有比較合理的解釋。

最後，簡單談談盛唐邊塞詩產生的文學因素。

邊塞詩至唐代大盛，形成重要的詩派。但邊塞詩的產生並非始於唐代。隨着漢帝國的建立，「守四方」成爲日益重要的政治、軍事問題。武帝「外事四夷，內興功利」，抗匈奴，通西域，戰事較繁，這就必然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。漢樂府如《戰城南》、《十五從軍征》、《飲馬長城窟行》等篇，可以看作邊塞詩的濫觴。其中反對黷武戰爭、征人思婦相思之情等內容，成爲以後邊塞詩作的傳統題材。其蒼涼悲壯的風格，亦對後世有較大影響。

漢末天下大亂，戰爭接連不斷，人民流離失所。曹操寫軍旅征戍生活的詩有《苦寒行》、《却出東西

門行》等。陳琳的《飲馬長城窟行》用秦代築長城之事，深刻揭露了當時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。曹植的《白馬篇》塑造了一個爲國立功，不惜流血犧牲的愛國壯士的形象，充滿豪壯樂觀的精神。後來高、岑詩中的戰士形象便是它的繼承。西晉末年的劉琨，在他後期保衛中原的戰鬥生活中寫的《扶風歌》，有深厚的愛國感情。晉宋之交的鮑照，寫有不少邊塞題材的名作，如《代出自蓟北門行》，抒寫壯士從軍衛國的壯志和描繪北方邊地風物，氣勢豪壯昂揚，意境蒼涼，開盛唐邊塞詩的先路。特別是他對七言古詩體裁的發展，對「四傑」、李白、高適、岑參的創作影響較大。另外，北朝樂府民歌中也有關於邊塞的題材。如《折楊柳歌辭》表現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，《隴頭歌辭》寫征人游子飄零的身世，《敕勒歌》描繪草原遼闊、牛羊繁盛的大西北景色，也爲唐代邊塞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借鑑。

至隋，隨着戰事的增多，一些由北朝入隋的詩人如盧思道、楊素、薛道衡等，大都有從軍邊塞的經歷，寫了一些較好的邊塞詩。其中盧思道的《從軍行》反映征人思婦思念之苦，諷刺將軍邀功求寵，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。又如楊素的《出塞》和薛道衡的《昔昔鹽》，在藝術上都有獨創性。初唐「四傑」積極開拓詩歌的思想內容領域，邊塞詩在他們的創作中佔有較重的地位。如駱賓王曾久戍邊城，邊塞詩數量較多，如《從軍中行路難二首》、《夕次蒲類津》詩，既有立功報國的豪壯胸懷，又有邊塞生活的親切見聞。陳子昂從軍東北，有現實性很強的邊塞詩。如《感遇》中「朝入雲中郡」、「丁亥歲云暮」、「蒼蒼丁零塞」、「朔風吹海樹」等篇，對戰爭造成士兵的痛苦和人民災難表示同情，對邊帥無能、統治者驕武開邊表示憤慨，這些內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擬古題邊塞詩的傳統風氣。而「四傑」的七言歌行篇幅擴大，筆

勢縱橫奔放，對高岑邊塞詩體裁的影響很大。在這些基礎之上，出現了盛唐邊塞詩的全盛時期，於是高岑等人的出現。

二

高適（七〇二？——七六五年），字達夫，渤海蓆（今河北景縣南）人。他的生平主要分前後兩個階段，五十歲左右是這兩段的分界。

前段他很不得志。李頎說他「五十無產業，心輕百萬資。屠沽亦與羣，不問君是誰」。在這五十年中又大致可分為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兩個時期。

在北上薊門之前，他二十歲曾赴長安求仕，失意而歸，他寫道：

二十解書劍，西游長安城。舉頭望君門，屈指取公卿。國風衝融邁三五，朝廷歡樂彌寰宇。白雲皆言賜近臣，布衣不得干明主。歸來洛陽無負郭，東過梁宋非吾土。兔苑爲農歲不登，鴈池垂釣心常苦……彈琴擊筑白日晚，縱酒高歌楊柳春……

——別韋參軍

這裏一方面他揭發朝政的黑暗，貴族近臣壟斷政權，布衣之士遭受壓抑；另一方面寫自己客寓宋中，托身畎畝，生活處境非常艱窘，心情苦悶。但「彈琴擊筑，縱酒高歌」，意氣仍是豪邁的。

十年托身隴畝之後，他爲了尋求立功報國的機會，北上薊門。他說：

少時方浩蕩，遇物猶塵埃。脫略身外事，交游天下才。單車入燕趙，獨立心悠哉。

在北上途中，他游於魏郡（在今河北大名縣東），「睹物思懷」，寫下了借古抒懷的重要作品《三君詠》，歌頌了「濟代取高位，逢時敢直言」的魏徵、「縱橫負才智，顧盼安社稷」的郭震和「昌言太后朝，潛運儲君策」的狄仁傑。《舊唐書》本傳說他「負氣敢言，爲權幸所憚」，這和三君的氣質相類似，可見此三君是詩人倣效的榜樣。

北上薊門，東出盧龍塞，這是高適第一次出塞。初到薊門，他「題詩碣石館，縱酒燕王臺」，意氣豪邁地唱道：

北上登薊門，茫茫見沙漠。倚劍對風塵，慨然思衛霍。

抒寫報國立功的雄圖壯志。可是這次他的希望又落空了。不過他雖然沒有找到仕進的機會，對於邊塞戰士生活却有了親身體驗，這就爲他後來寫著名的《燕歌行》打下了生活基礎。

以後轉入浪游梁宋時期。這一時期直到天寶八載舉有道科爲止。這時他一面「漁樵孟諸野」，另一面做富貴人家的賓客，就是本傳說的「以求丐取給」。有時也到山東、江蘇等地漫游，廣交朋友，投詩於達官貴人，尋求仕進的機會。長期的困頓，使他苦悶悲憤，但用世之心未嘗減退。他在《詠史》中這樣說：

尙有綈袍贈，應憐范叔寒。不知天下士，猶作布衣看。

這也是借古抒懷，表示了自己對前途的自信。

在長期交游中，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天寶三載，李白賜金放還，至洛陽，遇到杜甫，二人同游汴州，又與高適相遇。三位詩人「酒酣登吹臺，慷慨懷古」，然後同至單父，登宓子賤琴臺，獵於孟諸。這件事成爲文學史上的佳話，至今開封市禹王臺（即古吹臺）內仍建有「三賢祠」以紀念他們的盛會。季秋，高適和他們分手，南游楚地，自商丘沿汴東下，經鄆縣、鉅城、符離、靈璧、徐縣、泗縣、盱眙、淮陰、淮安，而抵襄賁（今江蘇漣水縣），寫了一篇《東征賦》，記載了安史之亂前的汴河方位，可以糾正《資治通鑑》的錯誤，有很高的史料價值，可惜未被人們注意，故特表而出之。

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是高適創作的豐收時期。他現存詩共二百四十四首，有一百七十餘首是這兩個時期的作品。《舊唐書》本傳說他「年過五十，始留意詩什」，這是不符合事實的。

此後轉入詩人的後一階段。這階段包括兩次入仕，這是高適個人歷史變化的時期。第一次入仕是天寶八載（七四九年），他的詩才受到宋州刺史張九皋的賞識，奏其所製詩集於朝，「薦舉有道科」，蹉跎半百的高適才獲得一個入仕的機會，心情非常興奮，在炎炎三伏天，十日趕到了長安，中第後，被專權妬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，祇授他一個小小的封丘縣尉，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。次年秋，他以縣尉身份送兵出塞，到達清夷（在今河北懷來縣）。他在《使青夷軍入居庸》詩中悲憤地寫道：

登頓驅征騎，棲遲愧寶刀。遠行今若此，微祿果徒勞。絕域水連下，羣峯雲共高。自堪成白首，何事一青袍！

回封丘後，他因深感「拜迎長官」的屈辱與「鞭撻黎庶」的痛心而棄官，寫下了名作《封丘縣》。不久，得到了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賞識與推薦，充任翰幕府掌書記，高適仕途顯達實始於此。

安史之亂爆發，高適以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。潼關失守後，他奔赴行在，見玄宗陳述軍事形勢，遷侍御史，擢諫議大夫。

玄宗在蜀，用諸王分鎮，高適切諫，以為不可，為肅宗所知。數月後，永王璘據金陵起兵，肅宗即召高適計議，適分析形勢，認為永王必敗，深受肅宗嘉獎，就任他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（從三品），淮南節度使，使討永王璘。高適一躍而為雄藩重鎮的封疆大吏，成為開元、天寶時期詩人中最顯達的人物。胡震亨曾評論說：「高適，詩人之達者也。其人故不同。（杜）甫善房瑄，適獨與瑄左（謂反對房瑄諸王分鎮事）；（李）白誤受永王璘辟，適獨察璘反萌，豫為備。二子窮而適達，又何疑也。」（《唐音癸籤》卷二十五）這三位詩人的仕途顯蹇，確與對這次重大政治變動的態度有關，胡氏之說是有道理的。

次年，永王敗死。大宦官李輔國惡適敢言，在肅宗前進讒，降官為太子少詹事，出為彭州（今四川彭縣）刺史，寫了自敘生平經歷的名作《酬裴員外以詩代書》。遷蜀州（今四川崇慶縣），代宗初遷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使。未幾，召為刑部侍郎，轉左散騎常侍，卒，諡忠。

高適的創作，以邊塞詩成就為最高。

他第一次出塞，北上薊門，親身體驗了邊塞士兵的生活，寫下了《薊門行》五首。在詩中，他對「士卒厭糟糠，降胡飽衣食」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憤慨，並給予深切的同情。他說：「關亭試一望，吾欲涕沾

臆。」對「胡騎雖憑陵，漢兵不顧身」的英勇愛國、不惜獻身精神則予熱情的歌頌。而對士卒長期戍邊，夫婦離別又表示了關心：「羌胡無盡日，征戰幾時回？」

開元二十六年，他創作了最傑出的代表作《燕歌行》。這首詩從序來看，與張守珪部將打敗仗有關，但其內容寫的却不全是這次戰役，而是把他在薊門的見聞，進行更高的藝術概括，從而表現了他對戰士們的體恤和對他們英勇的愛國精神的贊美，這些都超過了歷來的問題之作。詩中描寫了戰鬥的激烈和艱苦，並以「戰士軍前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」這樣鮮明的對比，深刻揭露了將軍和士兵苦樂懸殊的生活和唐朝軍政的腐敗黑暗。由於將帥無能，恃恩輕敵，以致陷入重圍，戰事不解，使士兵和家人遭受長期離別的痛苦。「相看白刃血紛紛，死節從來豈顧勳」兩句，熱情歌頌了戰士們為國獻身的愛國精神。由於征戰辛苦，所以希望有李牧那樣的將軍來克敵制勝，保境安邊：「君不見沙場征戰苦，至今猶憶李將軍！」此詩用具體的描寫把塞外大漠的荒涼環境、劇烈悲壯的戰鬥氣氛、戰士在戰爭過程中的內心活動巧妙地交織在一起，形成了雄渾深厚、悲壯淋漓的藝術風格。全詩四句一轉韻，多用對偶句和律句，詩的音律隨着內容的轉變而轉變，使音節的抑揚頓挫與詩的意境獲得和諧的統一。

由於詩人自己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，所以他對保衛邊疆的愛國將領作了熱情的歌頌。如《送渾將軍出塞》中對渾將軍的刻畫是很出色的。在敵人入侵，「昨日邊庭羽書至」的時候，渾將軍即慷慨出征。「城頭畫角三四聲，匣裏寶刀晝夜鳴」二句不沾渾將軍本身，却正襯托出將軍忠勇為國、心情異常激動的精神面貌。「黃雲白草」的塞外風光，與「擊劍酣歌」的昂揚精神，進一步突出了一個不畏艱苦、為國

忘身、心情樂觀的愛國將領形象。通篇嚴整而飛動，魄力雄毅，風骨遒勁，與《燕歌行》同樣表現了高適七古的藝術特徵。

對於收復失地，高適同樣是興奮鼓舞的。天寶十二載五月，哥舒翰收復久已淪陷的九曲黃河，他寫了豪壯而充滿喜悅心情的《九曲詞》，其第一、第三首云：

萬騎爭歌楊柳春，千場對舞繡麒麟。到處盡逢歡洽事，相看總是太平人。
鐵騎橫行鐵嶺頭，西看遼遼取封侯。青海祇今將飲馬，黃河不用更防秋。

在這裏也表現了他希望鞏固邊疆，獲致太平的願望。

其次，是反映時事的詩歌。其內容主要是對唐玄宗晚年昏聩的諷刺和對安史之亂的痛恨。例如唐玄宗晚年寵信安祿山，而安祿山却是一個詭詐反側、屢次挑起邊釁、以所謂「邊功」來市寵的家伙。高適在送兵到清夷時，就體察到他以邊兵為個人市寵的犧牲品，在《答侯少府》詩中就指出「邊兵若芻狗，戰骨成塵埃」的可悲事實。而玄宗却對他越來越寵信，連年加官進爵，高適在《薊中作》（亦作《送兵還作》）中用比較含蓄的語句說：「豈無安邊書，諸將已承恩」，對玄宗的昏聩濫賞進行了諷刺。

到天寶十載，安祿山居然「出入宮掖不禁」，「頗有醜聲聞於外」，而玄宗竟聽之任之。高適為此寫了借古諷今的《辟陽城》詩。詩中借審食其與呂后私通事來影射安祿山與楊貴妃的曖昧關係。這類直指最高統治者、揭發其宮闈醜事、寓意深刻的諷刺詩，在當時是罕見的。

對安史之亂，高適的態度是鮮明的。他在《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》中寫道：「河華屯妖氣，伊瀍有戰聲。」他撫劍悲歌，心存戡難，還致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，解睢陽之圍。及九節度使兵潰於鄴城（在今河南安陽），他目睹國家殘破，人民遭到殺害的慘狀，寫了《酬裴員外以詩代書》一詩，詩中有四句說：「縱橫荆棘叢，但見瓦礫堆。行人無血色，戰骨多青苔。」反映了中原經過這一番殺戮洗劫之後，一片破瓦頽垣，白骨縱橫，人民流離的悲慘景象。關於鄴城戰役所造成的浩劫，祇有在高適這首詩中得到具體的描述，這是它的可貴之處。

再次，他深入地反映了農民疾苦。由於高適長期貧困，有「兔苑爲農歲不登，鴈池垂釣心常苦」的親身感受，所以他能够關懷民生疾苦。屬於這類的詩作有《東平路中遇大水》、《自淇涉黃河途中作》等。前者用白描手法寫出了農村遭受水災，因而「農夫無倚着，野老生殷憂」的情景；後者揭示了農民在旱災和重稅剝削下的貧困和農村凋敝的生活景象：「去秋雖薄熟，今夏猶未雨。耕耘日動勞，租稅兼烏鹵。園蔬空寥落，產業不足數。」開元天寶詩人中，高適是第一個反映農民痛苦的詩人。

正因為如此，高適對能够關懷民生的地方官是稱頌的，特別是對春秋時宓子賤爲單父宰「琴和人亦賢」的良政作了多次歌頌。後來他自己任州牧時即以子賤爲榜樣，《舊唐書》本傳說他「屢爲藩牧，政存寬簡，吏民便之」。

此外，高適還寫了較多的自傷不遇的詩歌，反映出儘管是盛唐時期，大批人才仍然遭受壓抑的不合理的社會現實。詩作如《別韋參軍》、《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》等。

總上所述，可以看出高適是一個拓落不羈、崇尚節義、有匡時之略和負氣敢言，氣質慷慨的人物。他的詩如其人，內容從多方面反映人民疾苦，揭露社會矛盾，抒寫愛國熱情和懷才不遇的感慨。其語言質樸爽朗，直抒胸臆，魄力雄毅，氣骨琅然，多慷慨悲壯之音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。

三

岑參（七一五？——七七〇），南陽（今河南南陽）人。他的生平大略可以分爲三個時期。

第一個時期是他三十歲出塞之前。岑參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，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，伯祖父長倩相高宗，伯父義相睿宗。開元元年（七一二），岑義坐太平公主謀逆遭誅，家道衰落。父親岑植曾兩任州刺史。參少年時，父逝，從兄受學，「能自砥礪，遍覽史籍」（杜確《岑嘉州集序》）。十五歲時，到嵩山少室讀書。在早期詩作中，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，恬然自適的思想情緒。但積極用世，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。二十歲，他「獻書闕下」，赴長安求仕，結果是「金盡裘敝，蹇而無成」（《感舊賦》），失意而歸。雖然如此，他繼續爲求仕而奔波，曾多次往返於京洛之間，還到河朔、邯鄲、冀州、匡城等地漫游。他在《感舊賦》中寫道：「出入二郡，蹉跎十秋，多遭脫輻，累遷焚舟，雪凍穿屨，塵縑弊裘。嗟世路之其阻，恐歲月之不留。陟城闕以懷歸，將欲返雲林之舊游。」這個時期，交游多爲僧人、隱士，加之仕途失意，佛家的避世思想時而在他身上有所表現。

直到三十歲，岑參纔應舉及第。中第後祇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的小官。他感嘆地說：「三十始一

命，宦情都欲闌。自憐無舊業，不敢恥微官」（初授官題高冠草堂）。此後到他三十五歲出塞前的四、五年間，一直身居微職，未得升遷。但詩人並不甘心久沉下僚，仍然尋求建功立業的機會。

以後轉入第二個時期。這個時期從天寶八載（七四九）到至德二載（七五七），包括詩人的兩次出塞。這是岑參一生中的重要時期。

和唐代其他從軍邊塞的文人一樣，岑參也選擇了在戎馬生涯中開拓自己前程的道路，一做以軍功致位的人物。天寶八載冬，岑參第一次出塞，赴安西（今新疆庫車）節度使高僊芝幕府任掌書記。初次出塞，詩人的意氣是昂揚的，他在《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詩中滿懷信心地寫道：

萬里奉主事，一身無所求。也知塞垣苦，豈爲妻子謀！

但在兩年多的軍幕生活中，詩人並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。天寶十載（七五一），他回到長安。次年秋，岑參和杜甫、高適、薛據、儲光羲相會於長安，同登慈恩寺塔，相互唱和，各自寫下了著名的詩作。他此時還僻居終南山，寫了一些送別、贈答的篇什。

天寶十三載（七五四），岑參被北庭節度使封常清辟爲節度判官，第二次出塞。這次出塞由於受知於主帥，所以胸襟開朗，心情振奮。他寫道：「何幸一書生，忽蒙國士知。側身佐戎幕，斂衽事邊陲。自逐定遠侯，亦著短後衣。近來能走馬，不弱并州兒」（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）。至德元載（七五六）又出任伊西、北庭支度副使。在北庭歷時約三年餘，足跡幾遍整個西北地區，生活閱歷大大